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世界历史

WORLD HISTORY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 19 册

战争与古代社会

War and Ancient Society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世界历史

WORLD HISTORY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第 19 册

战争与古代社会

War and Ancient Society

易建平 李安山/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与古代社会/李安山,易建平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2

(世界历史)

ISBN 978-7-210-05177-8

I. ①战... II. ①李... ②易... III. ①战争史—研究—
世界—古代 ②政治制度史—研究—世界—古代
IV. ①E19 ②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2433 号

战争与古代社会

李安山 易建平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75

字数:420 千字 印数:1-4200 册

ISBN 978-7-210-05177-8 定价:48.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2—1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总编室电话:0791-86898825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93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世界历史》学术顾问

齐世荣 刘家和 庞卓恒 何芳川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

主 任 武寅

副 主 任 于沛 吴恩远 周荣耀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吴必康 汤重南 李春放 张顺洪 张晓华

易建平 赵文洪 俞金尧 徐建新 郭 方

学术秘书 张晓华 (兼)

《世界历史》各卷负责人

《理论与方法》卷 / 于 沛

《经济发展》卷 / 吴必康

《政治制度》卷 / 徐建新

《民族与宗教》卷 / 郭 方 俞金尧

《战争与和平》卷 / 汤重南 易建平

《国际关系》卷 / 李春放

《思想文化》卷 / 赵文洪

《中国与世界》卷 / 吴恩远 张顺洪

《世界历史》编辑出版工作委员会

主 任 钟健华

副 主 任 周 文

委 员 朱法元 邓光东 周榕芳 林学勤

徐建国 彭新元 游道勤 朱卫东

书籍设计 揭同元

多卷本《世界历史》是我国第一部专题研究与编年相结合的世界通史类著作。它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力求通过对复杂的世界历史进程的系统研究,特别是通过对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入探讨,再现人类社会丰富多彩的历史图景,科学回答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揭示人类历史不可逆转的进步趋势,并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20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有多种“世界通史”问世。如英国《剑桥古代史》12 卷、《剑桥中世纪史》8 卷、《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4 卷;苏联科学院主编的《世界通史》10 卷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史学家 G. 巴勒克拉夫、美国史学家 L. S. 斯塔夫里阿诺斯、W. H. 麦克尼尔等人

对“全球史观”的探讨,促进了欧美史学中的“世界史”重构潮流的发展,近年在西方有《世界史》和《全球通史》等有一定影响的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述虽然各有特点,但任何一部世界史都是历史学家在一定的世界观、历史观及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指导下,对已经逝去的“过去”进行包括价值判断在内的历史选择的结果。

在我国,周谷城先生在 1949 年曾撰有 3 卷本《世界通史》,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在 1962 年出版了周一良、吴于廑教授主编的 4 卷本《世界通史》。“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吴于廑、齐世荣教授受国家教委委托,主编了 6 卷本的《世界史》,并在 1994 年问世,以后又有齐世荣主编的 4 卷本《世界史》出版。近年来,我国在世界通史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在全面理解、运用唯物史观,克服学术研究中的简单化、概念化、公式化倾向、重视生产力发展历史的研究、克服“西欧中心论”的影响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随着大批外交档案及各类原始文献解密,西方学者在世界历史的体系、全球史观、总体史学、叙述史和问题史学等方面提出了不少值得研究的问题,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特别是世界通史方面的研究,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无论从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实际,还是从改革开放的中国迫切要求对世界历史的深入了解来看,中国学者撰写一部新的世界史都是十分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

中国学者自己的世界通史研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到较大发展。整个世界史研究的进步,特别是对史

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和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争鸣,为世界通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而在理论、方法、学术思想的准备和科研队伍的培养上为撰写新的《世界通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本书是世纪相交之时,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对世界历史的独立理解,并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有中国特点的认识世界历史的体系。生活在当代的历史学家,如果不能把历史融化在当代之中,那他就不可能理解历史,写出历史感与时代感相结合的历史。同以往问世的《世界通史》相比,我们希望它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了解过去,清醒地认识现实,科学地展望未来。

本书采取专题与编年相结合的撰写体例,它的特点在于,强调以时间为纵线,点面结合;既有一定的时空涵盖面,又有重点专题上的学术深度,与教科书式的写法有别;与传统的世界通史性的著作相比,本课题的历史视野更加开阔,不回避当代社会发展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使世界史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中国史是世界历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与世界,将在本书中独立成卷,重点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碰撞、交融及互动。

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时,我们强调新颖的研究视角、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多层面的理论描述。它是当代中国世界史学者,在广泛汲取历代中外学者世界史研究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追踪当代世界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对世界历史进行系统的、科学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从时代的角度,回答当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从

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充分发挥世界史学科的科学认识功能和社会功能。

本著作是通史性的著作,有清晰的历史脉络,但不是编年体式的历史过程的叙述,而是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探讨人类历史矛盾运动的本质内容及内在联系,重视理论认识、理论分析和理论概括。鉴于本课题从世界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时间跨度还是在空间分布上,都比以往同类著作有新的突破,所以,传统的史学方法已嫌不足。在本课题的研究中,重视使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汲取哲学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宗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比较方法,等等。跨学科方法是对传统史学方法的补充和完善,是高质量撰写本著作的重要保证之一。

多卷本《世界历史》由理论与方法、经济发展、政治制度、民族与宗教、战争与和平、国际关系、思想文化、中国与世界等8卷38册组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和高等学校世界史学者们集体努力的成果。任何一部世界通史著作,都不可能涵盖世界历史上的一切问题、穷极历史认识的真理,并做出最后的结论。这部多卷本《世界历史》著作的完成,不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起点。

本著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的最终成果,学者们在课题立项、研究和撰写过程中,一直都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怀和支持。本著作还得到齐世荣、刘家 and 庞卓恒、何芳川等知名历史学家的学术指导。此

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江西人民出版社,也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世界历史》编委会希望,本著作的出版有助于世界历史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进一步加强中国世界史学学科的建设,加强中外世界史学者的学术交流,并在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世界历史》总编委会
2010年5月

导 言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与政治和经济共生并产生互动,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演变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战争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有必然,也有偶然。一种武器的发明可能大大促进政治制度的演进,而由其引发的战争或内部争斗可能使已有的政治积累毁于一旦,一切又重新开始;一位贤明的君主可顺应潮流及时应变,使政治变革骤然加速;一个保守的利益集团也可使政治体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在个别情况下,一种外来因素甚至可以改变政治演进的过程,或放慢,或加快,或终止,或倒退。当然,政体演变的主要动因系于国家内部因素和地区政治的变数,而非一种制度的引进或一种理论的借鉴使然。

战争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产物,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天起,它便以各种形式伴随着人类的演进。一般而言,不拥有军事组织的政治共同体极少,也很容易被其他

政治共同体消灭。^① 军事组织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保护所属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其主要目的是自卫和复仇,这是早期战争的根本原因。尽管如此,它仍然是一种政治行为。战争的起因多种多样。奥特伯恩曾将战争起因分为以下几种:征服和纳贡、扩大疆土、掠夺、获取战利品和荣誉、报复、自卫等,^②我们可以将这些战争起因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主要牵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争夺妻子、血亲复仇、获得并维护荣誉、自卫等,^③我们将这种类型称为“人—人关系”。另一类是人与物质(自然)的关系,即战争是为了某种物质利益,如纳贡、扩疆、掠夺,可称为“人—物关系”。征服必须有一个或多个具体目的,必须体现为人—人关系或人—物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战争的主体是人,两种类型的战争都是以人为中心。一方面,人—人关系引发的战争将导致物质利益的获得;另一方

① 人类学家奥特伯恩对 50 个原始民族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研究,发现只有四个不存在军事组织,即铜色爱斯基摩人(Copper Eskimo)、多罗博人(Dorobo)、提科皮亚人(Tikopia)、托达人(Toda)。这四个政治共同体所在的地理位置都比较孤僻。这种地理位置使他们不受外界干扰,与其他民族少有来往。安德鲁·维达主编:《争斗与战争:基思·奥特伯恩选集》(Andrew P. Vayda, *Feuding and Warfare: Selected Works of Keith F. Otterbein*,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Publishers, 1994), 第 44—45 页。克里特文明是少有军事冲突的古代文明例证之一,目前的研究尚未找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② 基思·奥特伯恩:《战争人类学》,载约翰·霍尼格曼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手册》(Keith F. Otterbein, *The Anthropology of War*, in John J. Honigsmann, ed., *Handbook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Rank McNally and Company, 1973), 第 923—958 页;安德鲁·维达主编:《争斗与战争:基思·奥特伯恩选集》,第 33—73 页。实际上,奥特伯恩这里提到的“征服”只是一种现象,难以构成一个起因。

③ 在古代,获得女人以达到正常生殖繁衍的目的曾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抢夺女人多次成为战争的起因。在希罗多德的《历史》的开篇即记录着希腊人入侵波斯是为了女人。在阿兹特克亦如此。“特诺切人开始挑起战端,是因为他们的男青年沿湖而上,一直侵入到特纳尤卡去抢掠妇女。在北美印第安人中间,抢掠妇女是使自己变得威风起来的常用办法。”乔治·C. 瓦伦特著,朱伦、徐世澄译:《阿兹特克文明》,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107 页。查格农(Chagnon)也曾认为雅诺玛摩人(Yanomamö)的战争是为了争夺女人。拿破仑·查格农:《雅诺玛摩人:狂暴的人民》(Napoleon Chagnon, *Yanomamö: The Fierce People*,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83, 3rd edition), 第 86 页。

面,人一物关系引起的战争必然导致对人的征服。我们在这里只是希望指出两者作为战争起因的区别。不容忽略的是,国家的形成导致了一个重要变化:战争的起因逐渐从人—人关系类型转为人—物关系类型,物质主义的取向成为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

战争是人类历史演进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矛盾的现象。战争无情地毁灭劳动成果,又不断地刺激着生产发展;它既是人类自相残杀的恶魔,又是科学技术创新的助产婆;它一方面破坏或阻碍正常的政治演变过程,另一方面又不断促进人类的政治发展。历史学家对战争的研究虽早已开始,但往往偏重于对战争及其历史背景的史实进行描述。与此不同,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对战争进行系统研究,但已经提出多种理论解释。安德鲁·维达率先提出了人口膨胀和自然资源两者之间产生矛盾的战争起因论。值得注意的是,他本人在1989年否定了自己的理论,认为有目的的人类行为必须从所处的环境中来具体分析。^① 奥特伯恩从战争的原因与影响两个方面列出了八对相关因素。他认为,引发战争的八个原因分别为生成的侵略性、挫折—侵略、传播、环境、战争目的、社会结构、军事准备与文化演进;与此相对应的八种影响为人类物种、我族中心、涵化(acculturation)、生态适应、模式与主题、社会组织、生存价值、国家起源。^② 他后来还进一步综合关于战争起因的两种对立理论,即结构论和生态论,认为目前所有运用到研究战争的理论或模式都包括三种因素,即单一范式中的三个变量:物质的原因、生效的原因

① 安德鲁·维达:《瑞典农耕者的扩张与战争》,见《美国人类学家》(Andrew P. Vayda, "Expansion and Warfare among Swidden Agriculturalists", i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63 (1961)), 第346—358页;维达:《解释为何马林人战斗》,《人类学研究杂志》(Vayda, "Explaining Why Marings Fought", in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45 (1989)), 第159—177页。

② 基思·奥特伯恩:《战争人类学》,见约翰·霍尼格曼主编:《社会文化人类学手册》第926—948页。

以及后果。^① 专门以雅诺玛摩人(Yanomamö)为个案研究的查格农曾先后对雅诺玛摩人的战争原因提出过四种不同解释:政治主权、女人、复仇和富饶土地。^② 布里安·福克逊曾提出过一种涵盖三个前提的战争模式,即物质主义的取向、战争决策者的动机和作为选择机制的战争。^③ 罗纳德·科恩提出了三种互不相同但相互关联的政治过程理论,即引发战争的条件、战争行为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对战争后果的解释。^④

这些关于战争的解释和理论无疑对本课题研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我们在这里需要探讨的是战争对古代政治体制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专门论著似乎不多。麦凯尔·曼在《社会权力的根源》中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了古代社会权力的演变,其中对战争

① 安德鲁·维达主编:《争斗与战争:基思·奥特伯恩选集》第177—178、195—198页。

② 参见拿破仑·查格农:《雅诺玛摩人的社会组织与战争》,见莫顿·弗里德、马文·哈里斯、罗伯特·墨菲主编:《战争:武装冲突和侵略的人类学》(Napoleon Chagnon, "Yanomamö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Warfare", in Morton Fried, Marvin Harris, & Robert Murphy, eds., *War: The Anthropology of Armed Conflict and Aggression*, New York: Natural History Press, 1968), 第158—159页;查格农:《研究雅诺玛摩人》(Chagnon, *Studying the Yanomamö*,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ton, 1974), 第xi页;查格农:《雅诺玛摩人:狂暴的人民》,第86、140页;查格农:《一个部落群体的生命历史、血缘复仇和战争》,见《科学》(Napoleon Chagnon, "Life Histories, Blood Revenge, and Warfare in a Tribal Population", in *Science*, 239(1988)), 第985、986页;查格农:《雅诺玛摩人》(Napoleon Chagnon, *Yanomamö*,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ollege Press, 1992), 第83、87页。

③ 参见布赖恩·福克逊:《人类学与战争:理论、政治学与伦理学》,见保罗·特纳、戴维·皮特及其他撰稿人编:《战争与和平的人类学》(Brian R. Ferguson, "Anthropology and War: Theory, Politics, Ethics", in Paul Turner, David Pitt & Contributors,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War and Peace*, Granby, MA: Bergin & Garvey, 1989), 第141—159页;福克逊:《解释战争》,见乔纳森·哈斯主编:《战争人类学》(Brian Ferguson, "Explaining War", in Jonathan Haas, ed., *The Anthropology of Wa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第26—55页。

④ 罗纳德·科恩:《战争与国家形成:战争制造国家与国家制造战争》,见布赖恩·福克逊主编:《战争、文化与环境》(Ronald Cohen, "Warfare and State Formation: Wars Make States and States Make Wars", in Brian R. Ferguson, ed., *Warfare, Culture, and Environment*,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1984), 第352—353页。

与社会权力发展的关系有所涉及。^① 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曾出版了《军事组织与社会》的专著,对这两种人类组织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但他对古代战争与政体演变的关系几乎没有论及。^② 何况这些毕竟都不是直接论述战争与政体之间关系的专著。库尔特·拉弗罗布和内森·罗森斯坦在1999年出版的论文集的导言中指出,他们在1994年讨论关于战争问题的课程时发现,尚未有一本像样的关于战争与社会的现代著作,“希腊和罗马的军事发展与其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前后关系之间的互动尚没有系统地比较研究过,这是一个我们都觉得令人迷惑的缺陷”。^③ 这一发现至少表明:本书探讨的课题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重要现象,但尚未为学术界所充分重视;本书作者所作的努力并非一无所用,而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

再来看看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战争史与古代政治体制史是两个不同的研究课题,当代学者对战争史的研究不多。雷海宗认为,在中国古代,秦以上的历史为自主与自动的历史,有政治社会的演变更革,人民肯当兵,对国家有责任感。反之,秦以下为静的历史,人民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这样一个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④ 这种观点是否对从事历史研究的中国学者有所影响,并导致对战争史不感兴趣,作者不得而

① 麦凯尔·曼:《社会权力的根源》(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Volume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 17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② 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军事组织与社会》(Stanislav Andreski, *Military Organization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③ 库尔特·拉弗罗布、内森·罗森斯坦:《导言》,见库尔特·拉弗罗布、内森·罗森斯坦主编:《古代与中世纪的战争与社会》(Kurt Raaflaub & Nathan Rosenstein, “Introduction”, in Kurt Raaflaub & Nathan Rosenstein, eds., *War and Society in the Ancient and Medieval Worlds: Asia, the Mediterranean, Europe, and Mesoamerica*, the Center for Hellenic Studies, Trustees for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第1页。

④ 雷海宗:《中国的文化与中国的兵》,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01—102页。

知;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学者对战争史(军事史、兵制史、兵器史)的研究相对薄弱。^①

相对战争史而言,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相当成熟。^②然而,战争对古代政体的演变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对此,学术界的研究并不多。在近来兴起的有关国家起源的讨论中,中国学者开始涉及这一问题,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战争对国家起源的影响。^③王震中先生认为,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促进作用是普遍的。

① 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战争史的研究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的《中国古代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1995年)为主要成果,包括先秦、秦汉、三国部分分册(1993年)、两晋、南北朝、隋唐部分分册(1995年)、五代、宋辽金夏部分分册(1992年)、元明清部分分册(1992年)。兵制研究也有成果问世,有陈群:《中国兵制简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刘泽华主编、兰书臣撰写:《中华文化通志·制度文化·兵制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断代的兵制研究主要有: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中华书局,1983年;王曾瑜:《金朝军制》,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等。此外,还有兵器史的研究,例如周纬:《中国兵器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等。赵国华的新作对中国兵家思想的演变作了有益的探讨,参见赵国华:《中国兵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从秦汉到明清,各种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以近世以来的秦汉史研究为例,有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钱穆:《秦汉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等。虽然这些均为断代史,但对其政治制度的研究已有独到之论。此外,一些专题论著则多有建树,例如程树德:《九朝律考》,商务印书馆,1927年;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孟祥才:《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人民出版社,1996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等。

③ 关于战争或征服与早期国家形成之间的关系,目前存在着两种基本观点。卡内罗等人认为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塞维斯和弗里德等人则认为两者之间无必然联系。参见罗伯特·卡内罗:《国家起源理论》,载《科学》(Robert L. Carneiro, "A theory of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in *Science*, 169(1970)),第733—738页。关于战争与中国王权形成和国家起源的关系,参见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15—248页;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1—366页。

他强调的主要是农业基础上的文明社会,其主要论据之一是,“城邑国家中城墙的修筑,就是由于战争的缘故”。^①他认为,战争起到了促进社会力量整合的作用,“战争要求各个小生态系统即各地区原始社会组织的团聚力以新的形式进一步加强,有着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的集团得到了发展;战争不但使地区内部原有的权力得以巩固,而且还促进了它的发展;战争还使部落和地区的保护神上升为国家保护神”。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未将战争与国家形成看做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国家是社会出现阶级分化时,受祭祀、战争、公共管理事务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部落或酋邦之类的族共同体之间的冲撞中诞生的。”^②

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认为,古代王权的形成与战争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由氏族制度向世袭王权转化的过程与五帝时代的战争紧密相连。“王权形成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化,并且使社会组织突破氏族的界限,形成越来越大的社会共同体。氏族制度过时了,需要建立新的秩序,而它产生的途径却与战争有直接关系。”^③谢维扬认为,征服战争的有无与早期国家专制政治和民主政治的发生发展有一种必然联系。部落联盟向国家转化的早期国家形成模式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与外部政治实体的冲突以及对武力的使用都几乎不占任何地位”。酋邦模式则正好相反,酋邦社会越是向较高的程度发展,也就越接近于国家的水平,征服的作用就显得越重要。“酋邦和由酋邦转化而来的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同征服与吞并之间的关系,构成国家形成的酋邦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④易建平反对这一观点,认为“与外部政治实体

①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361页。

② 王震中:《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第362—363页。

③ 李学勤主编:《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研究》,第215—239页。

④ 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58、210、211页。

的冲突以及对武力的使用”在早期国家形成的所谓部落联盟模式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征服战争与吞并行为并未导致谢维扬理论的专制政治的发生发展”。^① 我们不想在这里轻易下一个结论,只是希望从历史的演进中得到应有的启示。

战争对政治体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有多种可能性,主要依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而不同。战争可使王权加强,也可使王权削弱;它可以增强凝聚力,也可以削弱凝聚力;它可以产生社会分层,还可以产生无组织化,需根据不同的情况得出不同的结论。^② 战争对古代政体演变也可以产生多种结果,战争既可使政体产生,也可导致政体灭亡;既可使政体增强,也可使政体削弱。这种演变可谓无穷无尽,有的政体是在灭亡中产生,有的是在削弱中加强。虽然这种演变往往是战争的结果,但它有时也成为战争的导火索。

成功的战争既是一个国家政权整合功能的表现,又为进一步整合国家和人民提供了可能性。国家整合功能的提高是政体演变的表现或结果。大致而言,战争对政体演变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物质基础的奠定和扩展、意识形态的控制与再造、政治制度的改革与演变。首先,战争胜利导致了对新资源的控制,从而为整合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其次,集团之间的武装冲突可以增强“集团内”和“集团外”的意识,从而增强集团的凝聚力;战争的胜利提高了战胜民族的自豪感,加强了民族的内聚力,同时也为统治集团对民族进行教育提供了新的教材。为了在民众(包括战胜民

① 参见易建平:《部落联盟模式、酋邦模式与对外战争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易建平:《论古代非专制政治地区发展的差异》,《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② 军队的兵种对政治也有影响。例如,雅典时期的海军军舰对当时的政治民主化即有一定影响,因为海军舰队的指挥不像陆军要求集中,而是要求分散。参见麦凯尔·曼:《社会权力的根源》,第208—209页。